

##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章祖生 日期： 2004.4.28

##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东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 章祖生 导师签名： 陈尚秀 日期： 2004.4.28

## 中文摘要

清朝乾隆时期是中西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清朝国势渐趋鼎盛；而乾隆朝以后，清朝国势日衰，中西实力对比开始出现逆转，中西关系也随之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因此，研究乾隆时期的中西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从乾隆帝西洋观形成的历史基础入手，以说明其西洋观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并因自身时代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以及在这种西洋观的指引下对政策的影响。

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简单记述了目前关于乾隆时期中西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其成果，并指出本文研究原因及思路。

第二部分回溯了乾隆帝西洋观形成的历史基础，分顺康雍时期清朝知识界的西洋观和顺康雍三帝的西洋观。由于时代局限，这一时期无论是知识界西洋观还是顺康雍三帝西洋观都存在着很大的模糊和局限。

第三部分对乾隆帝西洋观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及其政策影响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乾隆帝在继承了前朝西洋观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和亲自与西洋问题的接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西洋观：其一，他认为中国无所不有，西洋各国必需天朝之物产。这主要是由于乾隆时期，中国国力强盛，疆域辽阔，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广泛的国内市场即可调剂各地商品之余缺，海外贸易看不到明显存在的价值；而当时西洋国家不远万里来华贸易，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丝绸、瓷器等，却不能出口适合中国人的商品。这使乾隆帝认为海外贸易可有可无，仅仅作为天朝怀柔远人的政治手段；其二，认识到“英吉利于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主要是由于来华贸易的所有西洋国家中，英国最为频繁，贸易额也较大；而且在与中国贸易中，常常伴随着武装冲突的发生，特别是洪任辉北上告状事件和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使乾隆帝更加清晰了英国的强悍地位。根据这一认识，在对外策略上，乾隆帝对英国尤为防范；其

三，认为天主教有害于中国之风俗人心。在乾隆帝看来，如果允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中国人入教、信教，就会产生背叛思想，是人心之大患，从而严禁天主教在华传播。

第四部分结语部分，将乾隆帝的西洋观放在 18 世纪的坐标轴下进行比较。纵向比较，乾隆帝的西洋观更加深入、明晰；横向比较又存在着很大局限性，始终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没有形成近代世界观念，这对其以后清朝统治者西洋观的形成及政策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西洋观 乾隆帝 天朝 英吉利 天主教

## ABSTRACT

The period of Qianlong emperor was a very important period o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rel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in Qing Dynasty. During this period, Qing Dynasty came to its prosperity gradually, but Qianlong emperor towards after, Qing Dynasty declined in every day. Chinese compared with Westerns in strength and began to take a turn for the worse. So, it is a focus question of the academia to study the rel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of Qianlong period. This text proceed with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what the conception of Western of Qianlong emperor forms, in order to proving there are deep historical backgrounds for the productions of the conception of Western, and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one's own era is different, and the impact on polic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ion of Western.

This text divides four parts altogether:

The first part review research focus o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relation and achievement of period about Qianlong at present briefly, and point out the research reason of this text and train of thought.

The second part track back Qianlong emperor's the conception of Western that was bounded on historical foundations at first. Divide and obey the conception of Westerns of three emperors of harmony of gentle and the conception of Western of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Qing Dynasty. Because of era limitation, it has to be very heavy limitation and fuzzy along there emperors regardless of the conception of Western intellectual circles this period. But has constructed the foundation that the conception of Western of Qianlong emperor forms.

The third part thinks that Qianlong emperor is towards the foundation of the Western thought before carrying on, according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contacts of Western problems in person have formed his own unique the conception of Western. The first, He thought China have by nothing, western countries as much as all need China produce. In the period of Qianlong emperor, the national power is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natural economy occupi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And it has formed

wide self-sufficient market system with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The Western countries came to China for trade. They took tea and silks from China, but didn't bring suitable goods for China. It made Qianlong emperor thought wrongly that China has everything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need its produce. It made Qianlong emperor think overseas must need trades and regarded as the favor of China for the political means of peoples only. The second, Qianlong emperor realized that "comparatively strong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Britain". This period, Britain is the most frequent in all western countries of trade coming to China, the volume of trade is relatively large too; and follow often the emergences of armed conflict in the trade with China, especially big to let brightness go up north and file a suit and Buddhist nun's diplomatic corps visit China halberd horse incident. It made Qianlong emperor clear the intrepid statuses of Britain. According to these at foreign strategies, Qianlong took precautions against particularly Britain. The third, Qianlong thought Catholicism was harmful for custom and heart in China. Especially at Yongzheng emperor prohibit after teaching, all parts disobey orders the teaching notes take place occasionally still sternly. It made Qianlong think religious authority not to be antagonistic to human rights and Catholicism in China travel, Chinese join in and teach, believe in a religion, will produce the thought of betraying. It is the greatest disaster of heart.

The fourth part concludes the speech part set free under the coordinate axis of the 18th century going on and compare Western views of Qianlong emperor. Compare vertically, these western ideas of Qianlong emperor deepen, and distinct further. Compare horizontally, there is very great limitation. There is not constraint of breaking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idea and has not formed the idea of the world of modern times. It had great influence for policy move towards and exert Qing Dynasty ruler the forming of western ideas.

**Key words:** conception of Western      Qianlong emperor  
the Celestial Empire      English      Catholicism

## 一、导 论

清朝乾隆时期是中西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时期。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的,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已进入“决定性的年代”<sup>①</sup>。这是因为,一方面清朝在乾隆时期走向鼎盛,强盛的国力使清廷对涉外事务包括西方事务采取了“偏之以威”的方针<sup>②</sup>;另一方面,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在产业革命发展过程中,加强了对华扩张的步伐。在双方接触日渐增多,而利益及外交理念又存在抵触的情况下,一些冲突不可避免的浮出水面。而此后,随着清朝国势渐衰,中西之间实力对比开始出现逆转。因此,研究乾隆时期的中西关系对我们理清清代中西关系发展的脉络及其流变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于乾隆时期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是对于乾隆时期西方人来华贸易政策的研究。关于清朝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是“闭关”还是“开放”的定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我国出版的一些清史论著中,就有学者将清朝前期海外贸易甚至整个对外政策视为闭关锁国政策。1979年,戴逸先生率先发表《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一文,明确提出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是闭关政策,由此揭开了近20年海外贸易政策研究的序幕,并且形成了截然相反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闭关政策,主要以戴逸、胡思庸等为代表;一种认为是“开海设关”的开放政策,如黄启臣、严中平等。而具体到乾隆朝时期,关于中西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口通商问题上。历来很多论述清朝闭关政策的文章,都把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所形成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或者说制度)看成是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标志性事件,其中争论集中体现在一口通商政策

<sup>①</sup> 参考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0页。

<sup>②</sup> 参考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9至99页。

的形成原因上，学术界大体上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乾隆帝本人及其大臣都具有闭关锁国的倾向，且广州已形成海外贸易垄断利益集团，而作为这一集团的主要代表杨应琚极力上奏准行一口通商；另一种意见认为洪任辉事件与乾隆帝限关政策的强化有着直接的联系，朱雍先生的论文《洪任辉事件与乾隆帝的限关政策》就深刻阐释了这一观点。最近，吾师陈尚胜先生的论文《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的形成与澳门问题》，对一口通商政策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进一步挖掘，他认为澳门问题留在乾隆帝心中的阴影，也是其加强闭关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以后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问题也将变的越来越明晰。

二是对于英使马戛尔尼使华问题的研究。目前关于这次使团访华研究的专著及论文比较多，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礼节冲突问题。关于马戛尔尼以何种礼仪方式觐见乾隆帝，中外记载截然相反。许多外国人，如美国的普理查德教授、法国的佩雷菲特先生以及当时的使团成员回国后留下的日记等，还有不少中国的学者，大多认为英国使臣并未向乾隆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只是按照英国的方式——单腿跪地或“行深鞠躬礼”<sup>①</sup>，目前这一观点占主流地位；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使臣在觐见的时候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如王开玺等，他们主要依据中国的史料记载。但现在的中外史料都不能直接证实马戛尔尼向乾隆帝恭行了三跪九叩之礼，都只是根据现有史料进行的逻辑考证和推断。另一个方面主要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成功与否问题。其一认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除了外交上的失败，基本上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持这一观点的人主要是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以及部分外国学者如班尼斯特、罗宾斯等；其二有部分学者认为马戛尔尼访华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种观点的代表如中国学者戴逸、谢兴尧、许玄风等，以及部分外国学者，如德魁奈（De Gulgnes）等；其三，还有学者认为，马戛尔尼使团出使既是失败的，也是成功的，如美国学者普理查德等。由于各家所持标准不一以及考察的侧重点不同，结论难免有所出入，甚至截然相反，但都

<sup>①</sup> [英]斯当东著 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77页。

各有道理，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三是对于乾隆时期天主教以及西方传教士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在明末清初中西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天主教及西方传教士问题的研究。从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此方面的论文约有 170 多篇。这些论文，涵盖范围广，涉及主题多种多样，较为集中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为：其一、关于耶稣会士来华活动评价。如何桂春的《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92 年第 11 期）、康志杰的《也谈〈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93 年第 10 期）、许明龙的《试评 18 世纪末以前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世界历史》1993 年第 4 期）、宝成关《明末西学东渐重评》（《学术研究》1994 年第 3 期）、《清初西学输入的成就与局限》（《史学月刊》1995 年第 3 期）等等。其二、关于来华耶稣会士及其与中国统治阶层关系问题。主要是对来华耶稣会士的个案研究方面，多集中在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传教士个人身上。试图从中揭示明末清初中西方文化接触与对话的内容与特点，探索总结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规律。其三、从科技角度评价耶稣会士在华科技活动。在乾隆时期，关于天主教与西方传教士问题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上述三个方面，其中对西方传教士来华活动评价上基本与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评价相类似。这一时期，关于传教士的个案研究显得比较突出，不再仅仅局限于成名的传教士，对一般的传教士也进行了试探性研究，如钱德明等。另外，学术界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乾隆帝在对待天主教政策上，继承了康熙末年及雍正帝的禁教政策，但笔者认为这种禁教政策的继承，不仅仅是禁教政策本身的继承，更多的是对天主教、西方传教士认识上、思想上的继承。关于这一点，将在文中进行试探性的论述。

上述研究基本上是在政策层面和中西关系史层面展开的，它对于我们了解清代中西关系的发展进程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人们对于相关政策背后的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却关注不够。毋庸置疑，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对于政策取向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对于乾隆帝西洋观的研究，必将有助于加



深对乾隆时期关于与西方国家关系以及政策走向的认识。

关于乾隆帝的西洋观，至今没有学者公开发表论文。只是 1993 年在中英通使二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郭成康先生曾经就此问题提出过，但也没有形成文字并公开发表出来。因此，本文试图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来探讨乾隆帝的西洋观，并将它放在清初的背景上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乾隆帝西洋观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

## 二、顺康雍时期的西洋观

中国人的“西洋”概念肇自元朝，那时有东洋和西洋之分，大体上以龙牙门（今马六甲海峡）和兰无里（位于今苏门答腊岛）为界。龙牙门和兰无里以东的南太平洋地区为东洋，龙牙门和兰无里以西的印度洋地区为西洋。清朝时期，“西洋”的内涵有所变化，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就是指西洋国，即葡萄牙；广义的主要是指欧洲。本文所指的“西洋”主要是侧重于广义的“西洋”，而所谓的“西洋观”，也主要是指对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等的认识，所探讨的乾隆帝的西洋观，也是乾隆帝在继承前代西洋观的历史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和亲自参与西洋问题的接触而形成。其历史基础主要为顺康雍时期清朝知识界的西洋观和顺康雍三帝的西洋观，具体表现为：

### 1、顺康雍时期清朝知识界的西洋观

顺康雍时期，中国社会仍然以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政治信条几乎达到麻木的程度，华尊夷卑的“华夷”观念更是根深蒂固，多数知识分子被禁锢在理学、八股、考据、词章的传统知识领域的泥潭中，脱离实际，闭目塞聪，死抱着古老的教条。而同一时期，西方已经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牢笼，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突飞猛进，并向东方农耕社会扩展，渗透西方文明，“西学东渐”达到了高潮。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清初中

国知识界在继承明末西洋观的基础上对西洋才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主要包括对西洋地理、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的认识。

其中西洋地理学方面，继利玛窦的《万国全图》之后，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比较有影响的世界地理学著作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庞迪我的《海外輿图说》和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 1623—1688)1674年编制的《坤輿全图》。《职方外纪》和《坤輿图说》中不仅包含了有关整个世界的自然地理的大量新信息，也为中国人展示了一副西方人文世界的壮丽图景。在文化景观和文化制度方面，两书介绍的内容比较多，包括服饰礼仪、饮食起居、建筑特色、生产活动、法律教育、婚丧习俗、宗教信仰、文化人物、社会保障等。而《职方外纪》对欧洲的介绍特别详细，对其风土人情、法律制度、宗教文化作了重点介绍，其中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介绍最为详细。《坤輿全图》则由东西两半球图组成，除表现五大洲、四大洋地理面貌外，还叙述了各地之奇禽怪兽珍鱼。图的四缘有6块椭圆形装饰的图说，左右最外侧的两块条幅是8块用西洋纹饰镶嵌的文字，分别对地球、日月星辰、地震、人物、江河、山岳、潮汐、风云等天文地理气象加以解释。

虽然传教士们为中国带来了世界地理知识，但中国知识界对世界的认识 and 关注程度，大多还停留在十分原始的水平，多数知识分子仍然拘泥于“天圆地方、中国居大地之中”的传统地理观，在观念上也抱着姑妄听之、疑信参半的态度。据《明史》记载：“(利氏)入京师中宫堂，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sup>①</sup>一些保守的士大夫对西方传入的地理学也是将信将疑，认为利玛窦“言天下有五大洲”，“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故有之，不可诬也。”<sup>②</sup>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利玛窦的《万国全图》把中国所处之地译为“亚细亚”，以西洋为“欧逻巴”，是居心险恶，因为“欧逻巴”“必夸大之语”；而“亚”者，《尔雅·释诂》云：次也；《说文

<sup>①</sup> [清]张廷玉等：《明史·意大利》，见《二十五史》，上海书局影印，第10分册，1986年。

<sup>②</sup> 《明史》卷326，《外国传·意大利传》，参见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0页。

解字》云：丑也；《增韵》云：少也。“细”者，《说文解字》云：微也；《玉篇》云：少也；可见“亚细亚”的中文则为“次小次洲也”。认为“明人甘受利玛窦之侮慢而不之觉，曾无一人悟其奸者。”王夫之的抨击更为激烈，他说：“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为地形之果如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则地之欹斜不齐，高下广衍，无一定之形，审矣。而利玛窦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为一丸，何其陋也！”<sup>①</sup>完全抹杀客观事实，作出简单的结论，显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没能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去面对西方地理学。仅有少数官僚士大夫在与西洋传教士的交往中，对世界地理有了一些正确认识，第一次有了世界概念。在他们的著作中出现了亚细亚、欧罗巴、亚墨利加、地中海、大西洋等新词语，改变了过去只有“天下”、“九州”的观念，开始认识到，地球是圆形的，“无起止，无中边。”<sup>②</sup>其中世界分为五大洲的新颖观点，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影响也较大。《明史·外国传》记载：“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泥加洲，为第五。”遗憾的是，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仅仅局限于中国学者中很小的圈子里，远没有成为一般有知识的中国人的地理常识。而天主教传教士介绍西学只是为了便于传播天主教，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也只是停留在打破中国人的“自我为中心”的“虚幻环境”这一层面上。

不过，由于这一时期来华贸易的英国商人逐渐增多，人们对英国开始有了了解，逐渐弄清了英国人是与荷兰人不同的另一种“红毛番”。到了雍正年间，部分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陈伦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而写的《海国闻见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明确了西洋各国的地理位置：“红毛者，西北诸番之总名，……葡萄牙者，澳门之祖家也。东北二面地邻是班牙，

<sup>①</sup> 王夫之：《思问录内外篇》，同治四年（1865）湘乡曾氏刊本，第35—36页。

<sup>②</sup>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16页。

西临大洋，南俯中海。是班牙，吕宋之祖家也。西北临大洋，东南俯中海。西临葡萄牙，东北接佛兰西。佛兰西者，西临大洋，北接荷兰，南临是班牙，东接那吗，东南俯中海，由中海之东，接联那吗。那吗者，天主国王处也，北接黄祁，东沿中海，而至民哞呻。<sup>①</sup>由民哞呻沿东南中海，而至西多尔其。由西多尔其东沿中海，至阿黎米也。由阿黎米也向西，沿中海之南猫喇猫里也之地，而出西洋。就民哞呻之陆地，东至死海，北联那吗。民哞呻者，天主之族类呀，此从中海东北之地而言。荷兰者，噶喇吧之祖家也。西临佛兰西，沿佛兰西而至西北，皆临大海。北面隔海对峙英机黎，东临黄祁，南接那吗，由荷兰北海而至黄祁。（黄祁，为匈牙利之译音。）黄祁者，均系红毛种类，素未通中国。近有舟楫来粤营生。南接那吗、民哞呻，东临普鲁社。<sup>②</sup>普鲁社，系俄罗斯种类也。西北接吝因，东临细密里也，南接惹鹿惹也，沿海而至细密里也，皆属北海。吝因者，西北海之国，亦系红毛种类，素未通中国。西南隔海与英机黎对峙。<sup>③</sup>细密里也，东临加里勿，东南接噶尔旦、三马尔丹，南至里海，西临俄罗斯，北系北海。<sup>④</sup>英机黎一国，悬三岛于吝因、黄祁、荷兰、佛兰西四国之外海。”<sup>⑤</sup>陈氏认识到“红毛番”并非仅仅指荷兰或英国，它是西洋诸国的总称，荷兰和英国都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而且还了解到西洋诸国特产情况，“惟英机黎一国产生银、哆啰呢、羽毛缎、哔吱、玻璃等类。”其中“葡萄牙者，澳门之祖家也”，“是班牙，吕宋之祖家也”，不仅清楚地看到葡萄牙与澳门之间、西班牙与菲律宾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且意识到隐藏在这种政治关系背后的殖民性质。对英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殖民侵略陈氏也有所认识：“戈什塔东之沿海地名有三：曰网礁腊，系英机黎埔头；曰房低者了，系佛兰西埔头；曰呢颜八达，系荷兰埔头。西之

<sup>①</sup> 那吗，即罗马，此指意大利半岛。民哞呻，今译威尼斯，指意大利北部。

<sup>②</sup> 普鲁社，即普鲁士。

<sup>③</sup> 吝因，为 Danco(丹人)之对音，即丹麦(Danmark)，意为丹人之国。英机黎，即英吉利。

<sup>④</sup> 加里勿，不祥。按加里勿之名，初见于南怀仁之《坤舆图》，何秋涛之《方备乘》谓《唐书》之结骨亦名居勿，即加里勿，在托穆斯科(Tomsk)附近。按结骨为 Kirghiz 对音，待考。北海，指北冰洋。

<sup>⑤</sup> [清]陈伦炯撰 李长傅校注 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7-68页。

沿海地名有二：曰苏喇，曰网买，皆英机黎埔头。”与陈伦炯同一时代的蓝鼎元也认识到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性质，他说：“极西则红毛、西洋为强悍莫敌之国，非诸番比矣。红毛，乃西岛番统名，其中有英圭黎、干丝腊、佛兰西、荷兰、大西洋、小西洋诸国，皆凶悍异常。其舟坚固，不畏飓风，炮火军械精于中土，性情阴险叵测，到处窥覘，图谋人国。统计天下海岛诸番，惟红毛、西洋、日本三者可虑耳。”<sup>①</sup>但陈伦炯、蓝鼎元的著作及其认识并不为当时的社会知识界所关注，仅仅只局限于个别知识分子中间，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局限于传统地理观。不过他们的分析也反映了当时中英交往日益密切的情况下中国知识界对英国的关注，而且对后来乾隆帝对于英国的认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时的官方思想虽然也承认“自古舆图所不载”的“绝域风土”，对当时世界地理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如在雍正年间成书的《明史》之《天文》、《外国》、《地理》等志中，也已基本吸收或采纳西洋地理知识，但缺乏刻意弄清事实、深入研究的积极态度，对来自西方的信息，仅仅归之为供人消遣的“存广异闻”一类，暴露出一定的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心态。

与地理学一样，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面对的另一课题是：在继承明末西学的基础上加深对西学的认识。明末从实用派中诞生出的西学派，就是主张学习“西学”，并亲身实践“西学”的思想派别，其代表人物徐光启从西学中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农业、水利等科技知识，译介了《几何原本》，撰写了《农政全书》。在他看来：其一，西洋之法优于传统历法；其二，翻译引进西洋历法融入中国传统历法《大统历》，其目的就是以求“会通归一”。而在传统思想文化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时代，历法不仅仅涉及的是历法本身，更重要地是，其象征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根源，赋予的政治含义十分浓厚，对这一点的承认，无疑代表其本人对西洋科学的一种先进认识。徐光启西学观中最可贵的思想就是通过会通中西，以期达到赶超西方的目的，即所谓“欲求超胜，必须会通”。虽然这一时期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西学派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还是片面、肤浅

<sup>①</sup> 《鹿洲初集》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

的，但其思维方式已从名教空谈的思想禁锢中迈出了最初的一步，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发端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明末清初时期，黄宗羲（1610—1695年）摒弃了其师刘宗周排斥西洋科学的保守西学观，深入研读《崇祯历书》。黄氏晚年（1682年）忆道：“西人汤若望，历算称开辟。为吾发其凡，由此识阡陌。”与徐光启相比，稍有差别的是，黄宗羲提出了借鉴西学以复兴中国传统历算科学的思想，但其会通的目标不是徐光启所追求的超胜西方，而是“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sup>①</sup>。虽然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黄氏表现了相当的真知灼见，但仍未突破“华夏中心”和“夷夏之辩”的传统观念。他认为：“勾股之学，其精力容圆、测圆、割圆，皆周公、商高之遗术，六艺之一也。”“珠失深渊，罔象（传说中的水怪，此指西人）得之，于是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这使其科学思想的历史意义减弱了很多，但也充分说明了黄宗羲这种复杂的西学观念正是早期启蒙学者思想嬗变的特征。

除此之外，黄宗羲还与当时学者王锡阐、梅文鼎等提出了“西学中源”说的主张。“西学中源”说沿自明末，即认为西学出于中国，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到了康熙时期，大数学家梅文鼎是这一主张的主要坚持者，他在《天元一即借根解》中说：后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且谕曰：“西洋人名此书为阿热尔热八达，译音‘东来法’”。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学之指南，而窃疑天元一之术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涣如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曰似之而已也。夫元时学者著书，台官治历，莫非此物。不知何故，遂失其传，犹幸远人慕化，复得故物。“东来”之名，彼尚不能忘所得。<sup>②</sup>另一学者邹伯奇在《论西法皆古所有》一文中，甚至认为西人“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墨子为西法始祖。他说墨经里已包含了西洋的数学、重学、视学等等，即使西方的旁行文字和所奉的上帝，也无非“祖其遗法”，“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sup>③</sup>。同时，知识界也将西学源出中国的时间由元代推到了虚无飘渺的远古时代，而其具体西播过程，

<sup>①</sup> 《黄宗羲全集》第10册。

<sup>②</sup> 梅文鼎：《赤水遗珍》，《梅氏丛书辑要》，1874年刻本。

<sup>③</sup> 《学计一得》卷下，见《邹微君遗书》。

也被杜撰成一篇玄妙的历史故事。完成于这一时期的《明史》，则在此前学者个人之说的基础上，系统地阐释为：“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欧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羲仲、羲叔、和叔则以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固便也。欧罗马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竞胜之习过之。故其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俗为之也。羲、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见者，仅有《周髀》。而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sup>①</sup>而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利用科学作为传教手段之时，也迎合了这一说法，把西方代数学（Algebra）的译名“阿尔朱巴尔”解释为“东来法”。康熙帝对此大加赞赏，他说：“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山禹传自东方之谓也。”<sup>②</sup>这样一来，“西学中源”说进而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一般士人甚至一些地方督抚，更加不遗余力地鼓吹西学于中国古已有之。雍正时，浙江巡抚李卫就特别声明：西学“所精者仪器，而璇玑玉衡，见之唐虞矣；所重者日表，而指南车周公曾为之矣；所奇者自鸣钟、铜壶滴漏，而汉时蚤有之矣；所骇人者机巧，而木流牛马，诸慕武侯已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时亦有之，至今尚有流传之者。是其说不经，其所制造，亦中国之所素有。”<sup>③</sup>从而，“西学中源”说在一定程度上被系统化、定型化。以致当时知识界形成了一种谬见，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中非不如西，王锡兰就是其中之一。他虽然承认“西历善矣”，但却又认为西法既原本于中法，就不可能“越其范围”<sup>④</sup>。从而反映了当时士大夫西学观念的倒退，最终限制了后人对西学的认识，乾隆帝对

<sup>①</sup> 《明史》卷 31。

<sup>②</sup> 《清圣祖实录》卷 245。

<sup>③</sup> 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 69，李卫《改天主堂为天后宫碑记》。

<sup>④</sup> [清]阮元：《畴人传·王锡兰》，商务印书馆，1955 年。

马戛尔尼使团礼品的轻视，就深刻反映了这一点。

从以上对顺康雍时期中国知识界西洋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一时期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洋已经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但他们人数太少，西洋认识仅仅局限于个别知识分子之间，没能形成较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对西洋的基本认识状况和思想传统并未得到明显改变，对后世影响很大，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乾隆帝对西洋的认识。

## 2、顺治、康熙、雍正三帝的西洋观

顺康雍时期，由于时代局限，中西之间官民交往并不是很多，主要往来是“西学东渐”、西方商人来华贸易和西洋传教士传播天主教，而且基本为民间往来，被动的接受，官方往来很少，缺乏了解西洋国家的主动性。因此，顺康雍三帝在对西洋认识上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而且主要是围绕天主教、西学、海外贸易而展开，对西洋国家的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等皆不甚了解。

顺治帝时期，“因其初入关，享国不久，明藩犹在，战无虚日”，与西洋国家接触不多，中西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则是朝廷对于天主教和西方传教士的认识问题和法律问题。因此，顺治帝的西洋观主要是以对天主教和西方传教士的认识为中心。

回顾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历史，顺治帝对天主教和西方传教士一直采取优容礼遇的政策，对传教士极为重视，并积极地加以任用和保护。清兵入关后，顺治帝曾下令北京城内的汉人三日内全部迁出，传教士也在迁出之列，汤若望立即向顺治帝上疏陈请，说：“曾奉前朝故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帙，付工刻板，尚未完竣，而板片已堆积累累，并堂中供像礼器，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多，若欲一并迁于城外，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其测量仪器，由西洋带来者居多，倘一损坏，修理既非容易，购办又非可随时寄来，特为沥情具折，恳请皇上恩赐，臣与同伴诸远臣龙华民等仍居原寓，照旧虔修。”顺治帝在第二天就批准同意汤若望等继续留京，并在同年12月23日，任命汤



若望掌管钦天监，令“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此时即指汤若望）<sup>①</sup>1653年3月20日，顺治帝又赐其号“通悬（玄）教师”<sup>②</sup>，后来又封他为“光禄大夫”，进秩正一品。从政策层面来看，反映了顺治帝在涉外关系上采取了比较务实的策略；但上升到思想认识层面，其对天主教、西方传教士采取优容礼遇政策，并不能代表顺治帝本人对天主教、传教士的认同。

明末清初时期，天主教是第三次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唐朝的“景教”，后因唐武宗灭佛而消亡；第二次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但因元朝的灭亡又暂时从中国退出，没有在中国生存发展下来，更没有给中国人的思想留下烙印。其第三次东来，主要是由于利玛窦采取了比较灵活的传教策略，学汉语、穿儒服，用中文名字，结交官僚士大夫，走上层路线，使得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包括顺治帝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对天主教有深刻认识，顺治帝之所以允许天主教在中国存在、发展下去，只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基本都能严格遵守利玛窦传教策略，而利玛窦传教策略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合儒”、“补儒”、“超儒”，而这一点从表象上正与中国传统文化、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相吻合，或者说不矛盾、不冲突。而对传教士给予保护和重用，也就不是因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给中国人带来真主和福音。在顺治帝看来，只是为了利用其历法等科学技术，而对历法的利用，除了因为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历法比中国传统历法精确性高、正确率大，更重要的是这种更正确的历法赋予了新的王朝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法基本代表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理论根源；而且清朝为满族人建立，按传统地理观念，就属于“夷狄”，这样的话，用西洋人的历法，并不存在“以夷变夏”的思想争论。当然，这也只是在清朝统治初期，满族人还没有完全接受汉文化，儒家思想还没有被满族统治者所理解、接纳的情况下。一旦被理解、吸收，情况就不一样了。康熙时期，杨光先就喊出了“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西人来传教，无非要谋我中国。澳门

<sup>①</sup>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1。

<sup>②</sup>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3。

屯兵众多，汤若望为彼首脑，不可不防。西人修历，使中国举西洋之正朔，是使我屈服洋人，有辱国体。”

与对待天主教、西方传教士的友好态度相比，顺治帝对待西方国家使团则有很大差别。1653年和1655年荷兰两次派使来华，广东地方政府派人护送荷兰使节到京，一开始礼部讨论同意其五年一贡，但顺治帝认为荷兰“道里悠长，风波险阻，舟车跋涉，阅历星霜，劳勋可悯，若贡期频数，猥烦多人”，遂决定“著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sup>①</sup>他还先后两次拒绝了俄国使节，并认为：“外邦从化，宜加涵容，以示怀柔。鄂罗斯远处西陲，未沾教化，乃能遣使奉表而来，亦见慕义之忱。来使著该部与宴，贡物察收，察罕汉及其使量加恩赏，但不必遣使报书。”<sup>②</sup>其中顺治帝认为荷兰“道里悠长”是确实不知道荷兰海程，还只是作为其“著八年一次来朝”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但与拒绝俄罗斯使团相比，应该说其目的差异不大，而俄罗斯“远处西陲”的距离，顺治帝是很清楚的。这就不难看出，无论是拒绝荷兰，还是俄罗斯，其目的都是一样，都是为了把西洋及一切宗藩以外的外来势力排拒在天朝之外，“外邦从化，宜加涵容，以示怀柔”正是这一思想潜意识反映。自视为“天朝上国”，其他外国都是化外蛮夷之邦，欲把广阔的世界纳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按照封建等级、名分构成的朝贡体系之中，谒见礼节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顺治帝虽然没有明确外国使臣谒见帝王须跪拜的法律，但在事实上，使臣只有向帝王叩头，才被帝王接见或赐予国书，即使帝王有重大之事需要面谕或赐书，也必须按此行事。乾隆帝就受此影响很深，仍然用传统的对周边“夷”国的观念处理西洋事务，在接待马戛尔尼使团过程中，乾隆帝这一思想、政策随处可见。

到了康熙帝统治时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已经到达中国近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发展。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与

<sup>①</sup>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103。

<sup>②</sup>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135。

顺治帝相比，康熙帝的西洋观念要深入、全面很多，但由于受传统观念及所处时代的局限，对西洋认识也还有很大的模糊。

在海外贸易问题上，虽然康熙帝曾下旨说：“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者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份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sup>①</sup>并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sup>②</sup>但这些措施并不能表明着康熙帝已经具备了与当时西洋人对等的对外贸易观念。平台湾后，海禁稍有放宽，但外贸仍只许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进行，须经由官商开设的公行，并限制进出口商品数量及种类（进口的更少）。与两宋相比，其外贸规模小，两宋时外贸港口达六七处。康熙帝虽然支持开海贸易，允许西洋商人来华贸易，甚至为外商来华创造便利的条件，招徕外商，但仍然局限于传统对外贸易政策。其西洋海外贸易理念为：一是坚持传统的“朝贡”制度，二是以“外衅不作”、“培养元气”为“根本任务”<sup>③</sup>。因而限制仍然很多，只准内商赴日本、暹罗等国家，不许去西洋各国贸易。根据资料记载，准内商赴日本、暹罗等周边国家贸易，主要是为了采购清朝相对紧缺的米、铜等物，应该说这是康熙帝停止海禁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许内商赴西洋贸易，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康熙帝认为大清帝国并不需要西洋物产，与西洋贸易没有任何必要性。反映出其传统的贸易观念并没有改变，没有认识到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力，没有看到对外贸易在西洋国家资本原始积累中的巨大作用。这对后来乾隆帝看待海外贸易、西洋物产问题上有很大影响，这将在本文第三部分作具体论述。

在对西学认识上，很多学者认为康熙帝具有较为先进的西学观念。理由是，在康熙帝统治时期，出现了“西学东渐”的黄金时期。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在平反5年前守旧势力排斥科学、制

<sup>①</sup> 《清圣祖实录》卷116。

<sup>②</sup> 《清朝文献通考》卷33。

<sup>③</sup> 《清圣祖实录》卷160。

造汤若望的冤狱中，了解了西方天文学。继汤若望之后，又任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康熙十三年(1674年)由南怀仁督造“天体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法国传教士纪理安铸造“地乎经纬仪”；同年康熙接受南怀仁“条陈”，对“时宪历”删除闰月；接受传教士安多以奎宁治愈虐疾。此外，在康熙三十七至四十四年间(1698—1705年)传教士安多、白晋、雷孝思·巴多明等人奉圣祖差遣“覆勘”多条河流，包括东北的运河，“测量绘制北京近郊地图”。当传教士们向其陈奏“中国把道德、哲学视为主要学问，却极端忽视哲学以外的其他学问”时，康熙帝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让张诚、白晋、徐日升、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等人向其进讲“几何学”、“算术”、“欧洲哲学”，“教授仪器的使用”等自然科学知识。二十九年(1690年)，在北巡和木兰秋狩中，令张诚、白晋、安多、闵明我等人扈从，携带仪器，圣祖学习“测量山高和地形面积计算”；为了学习阿基米德定律，遣内务府人与苏霖神甫去广州购仪器，还于畅春园组建了“算学馆”。1715年，康熙帝再次授意传教士马国贤致书教皇，要他选择精通“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几人来中国以效力”<sup>①</sup>，主要从事天文历法、地理测绘、制造兵器、担任翻译以及为康熙帝讲授西方的科技知识等。

根据以上康熙帝与西洋科学接触的史实，有学者认为康熙帝看到了西洋科学的价值，具备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西学观念。其实不然，康熙帝对西洋科学的运用，从实质上来说，给人的只是一种表象，其对西洋科学并非真正感兴趣，只是将西洋科学当成摆设而已；或者说即使康熙帝对西洋科学感兴趣，也只是个人的一种兴趣爱好，并没有认识到西洋科学在国家富国强兵过程中的作用，其富国强兵、维护统治的治国理念仍然局限于传统思维的固定模式里。汤若望、南怀仁的天文历算虽然精确，却只是用来为宫廷迷信活动服务；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花费三十年测绘出《皇舆全览图》，只是放在深宫里，当作绝密的军事文件收藏，先进的地理测绘方法并没有得到推广，全国印刷业、测绘业也未因此而得到提高；南怀仁

<sup>①</sup>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

制造出的西洋火炮虽然受到他的夸奖,但并没有引起他对军火工业的重视,军事战略思想还是处于冷兵器时代,对西洋的军事文明表现出漠不关己的姿态;西洋的科学著作虽然翻译过来了,但国家取士依然根据《四书》、《五经》,西方科技却深藏于内廷。由此可见,康熙帝依然严守封建文化的藩篱,无视西洋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教育的更新。以致在众多方面一向效仿他的乾隆帝,受此影响很大,再加上清初知识界“西学中源”说的影响,使他在面对马戛尔尼送来的先进科技礼品也只是“视觉平常耳”,漠然视之。只是将礼品赏给有关王公大臣和宫内有关机构使用,作为自己统治上的炫耀,甚至谕旨垂询“该国呈进天地二球尺寸大小高低是否与宁寿宫等处现陈设之天地球相同”<sup>①</sup>,如果是一样的,英国人就不能“自以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sup>②</sup>。

关于康熙帝对天主教、传教士的认识问题,历来研究的比较多。与顺治帝相比,康熙帝对天主教的认识又有所不同。由于与传教士交往频繁,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教义、教规和耶稣生平了解较多,从下面这首诗即可看出:

妙道玄玄何处寻,在兹帝监竟森森。群生蒙昧迷歧径,世教衰微启福音。  
自古昭昭临下上,由来赫赫显人心。而今基督恩光照,我也潜潜泪满襟。

所以康熙帝在处理“礼仪之争”时,一开始只是抱着观望的态度。但后来随着斗争的日趋激烈,他认为:“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敬孔子者,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敬也。”而西洋人“以天为物,不可敬天,此即大不通之论。比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过御座,无不趋跪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呼天为上帝,即如称朕为皇上,称呼虽异,敬君之心则一。”<sup>③</sup>因此,在以后处理天主教、传教士的措施上逐步严厉。1714年12月13日,他谒见在京传教士时说:“论中国的规矩,若不随利玛窦规矩,你们的教传不得,连西洋人也留不得。”

<sup>①</sup> 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8月第1版,第541页。

<sup>②</sup> 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8月第1版,第196页。

<sup>③</sup>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

他还认为，“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乏礼？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字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天来人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可如何。”

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帝虽然与传教士接触较多，对天主教教义、教规也有所了解，甚至与传教士谈论教义、教规，但同样没有从心理上认同、接受天主教。传教士说康熙帝会成为天主教徒，难免有夸大之嫌；或者说是康熙帝优容礼遇天主教的一种文化误解。康熙帝优容礼遇天主教、传教士，只是在吸取了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表现出对天主教的一种文化兼容性。多神崇拜使中国人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宗教性格，使他们能平等的对待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天主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之所以能易于被人们接受，正是有赖于中国人的这种文化性格。而这种兼容性是排他性极强的天主教传教士所无法领会和理解的。起初康熙帝虽然不反对在中国的西洋人信奉天主教，但禁止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后来虽然取消了这一禁令，<sup>①</sup>但取消禁令的原因首先是从西洋传教士对朝廷的贡献考虑的。他说：“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法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俄罗斯亦有劳绩，并无恶乱之处”，因此，“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旧行走，不必禁止。”<sup>②</sup>“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许他去的时节，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著督抚差家人送来。”<sup>③</sup>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其一、康熙帝之所以允许天主教在中国存在，允许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是因为传教士具备科学技术才能；其二、传教士传教必须严格遵守“利玛窦规矩”，也就是说必须在服从中国本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在不威胁其大一统的统治思想上才可以传教，否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sup>④</sup>“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帝虽然与西学、传教士接触颇多，但对西洋国家的发展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对西洋国家的政治结构、经济制度、军事文明的

<sup>①</sup>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卷9。

<sup>②</sup> 《正教奉褒》第115页。

<sup>③</sup>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234条。

<sup>④</sup>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220页。

了解。虽然他曾说过：“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sup>①</sup>众所周知，这句话的确与后来的历史事实发展相印证，但这究竟是因为康熙帝本人对西洋军事文明有着清楚的认识，还是根据仅有的感性认识作出推断的一种巧合，我们很难作出结论。因为在雅克萨之战、平定三藩的战乱中，康熙帝就已经看到了西洋大炮的威力，所以这句话并不足以反映出康熙帝对西洋军事入侵的清楚认识。而“千百年后”一语，反而证明了康熙帝对西洋军事文明认识的模糊性，认为西洋国家在短时期内还构不成对大清安全的隐患，所以在1718年，当陈昂、陈伦炯父子从海外游历5年归来，奏请弛海禁以苏民困，特别提醒清廷注意海防安全，警惕西方以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为代表的强盗的入侵时，康熙帝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康熙帝的这种态度对后世帝王的西洋认识也有很大的影响。

康熙帝之后，雍正帝由于统治短暂，在中西交往、对西洋国家的认识上，基本上承袭了前朝的观念。

在对天主教、传教士认识上，经过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和平时的耳濡目染，雍正帝已经意识到天主教对大清、对自己的君主专制存在隐患。他说：“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凡天下中外设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亲、奖善惩恶、戒淫戒杀、明心性、端人品为务者。其初创设之人，直常非寻常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久久奉行。”但“末学后人敷衍支离，而生种种悖谬之说，逐成异端。”<sup>②</sup>同年7月21日，雍正帝在圆明园召见西洋传教士宋君荣等人时，他说：“朕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国王也不会允许。先皇许尔等在各省建立教堂，有损圣誉，朕岂能容许有损先皇圣誉之教堂存在？儒教与尔等之教相距甚远。”“尔等也有和中国各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尔等有十诫，这是好的。然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耶稣），还有所谓永恒的

<sup>①</sup> 《清圣祖实录》卷270。

<sup>②</sup> 《雍正帝起居注》，五年四月初八日条。

苦，永恒的乐，这是神话，再荒唐不过。”<sup>①</sup>而所谓成为人的神，在雍正帝看来，其实就是成为神的人。显然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天主神权与自身君权的冲突，而且他还认为：“本地无赖之人相与往来，私从其教。恐久之湍染益深，甚有关于风俗。”<sup>②</sup>因此，他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毫无裨益。由于对西洋科技没有康熙帝那样的个人兴趣，雍正帝认为西洋传教士对中国也是毫无用处。他说：“西洋人何裨益于我中国。彼寄居广州被逐出境，乃理之当然，又何词之有。”<sup>③</sup>更加严厉驱逐传教士。乾隆帝后来在禁止天主教传播方面基本上继承了雍正帝这一政策，而反映到政策层面的背后，更重要的是思想认识上继承。

在海外贸易认识上，雍正帝的认识也很保守，对外商在华贸易，“以固本防患为先”<sup>④</sup>。其对国人海外贸易，虽然较康熙晚年的立法宽松，然而亦诸多限制，未脱封建保守的窠臼。虽然他在位期间重开南洋之禁，但目的不在于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相反他认为“此等贸易外洋者，多不安分之人。”<sup>⑤</sup>由于缺乏对西洋国家的了解，继承、并保持了传统的贸易观，所以面对西洋人日益频繁的来华贸易，在措施上，雍正帝也表现的无所适从。他说：“朕实不达海洋情形，所以总无主见。有人条奏，朕观之皆似有理，所以摇惑不定。”<sup>⑥</sup>“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尔等地方大吏，不可因目前便利而贻他日之害。”<sup>⑦</sup>由于没有清晰的了解，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对西洋贸易本能的畏惧，总认为这种贸易背后隐藏着对大清统治的威胁，“立中外之大防”的护国观念根深蒂固。与政治统治的安全相比，海外贸易在他看来就变得可有可无。

通过以上对顺、康、雍三帝西洋观的论述，不难看出，顺康雍三帝在看待西洋问题上基本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因各自时期国内外环境和历史背景的不同，而显露出不同的特点。如在西学问题上，

<sup>①</sup> 《清代西人闻见录》，第145-146页。

<sup>②</sup> 《朱批谕旨》，七年湖南巡抚赵宏恩奏疏。

<sup>③</sup> 转引自陈东林《雍正驱逐传教士与清前期中西交往的中落》，《北京师范大学报》1985年第5期。

<sup>④</sup> 《清史稿·邦交志六》。

<sup>⑤</sup> 《朱批谕旨》，五年高其倬奏折。

<sup>⑥</sup> 《史料旬刊》第七期。

<sup>⑦</sup> 《朱批谕旨》，二年孔毓珣奏折。



三帝都对西学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政策，而限制西学，根本上是因为对西学的认识不足；在天主教、传教士认识上，三帝也都基本上保持了“非我族类，其心比异”的传统观念，虽然从措施上看，顺治、康熙对天主教、西方传教士采取了优容礼遇政策，雍正实施了严厉的禁教政策，但根本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对海外贸易在西洋国家原始资本积累中所起的作用，也都没能认识到，仍都拘泥于传统的贸易观。显然，与时代的进步相比，顺、康、雍三帝的西洋观都存在着很大的落后性，但他们的认识却很大程度上构筑了乾隆帝西洋观形成的基础，也预示着乾隆帝西洋观必然存在的局限。

### 三、乾隆帝的西洋观

乾隆帝统治时期，经过康熙朝平三番、收台湾，国内政治基本稳定，文治武功达到极盛；经济经过清初近百年的发展，已经进入承平盛世。而此时，西方社会在经过中世纪缓慢发展之后，开始了产业革命进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产力突飞猛进，对外贸易需求扩大，对外政策也由原来的殖民扩张向贸易扩张转变。而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先进国家，对西洋国家有很强的吸引力，“中国热”在西洋国家悄然兴起，这必然导致中西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交往增多，随着双方交往的增多，双方在彼此认识上也就较以往全面、深入。一方面，随着中西方贸易往来的增多，清朝统治者日益意识到同中国的贸易对于西方诸国的意义，并将这种认识运用到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策略中去。另一方面，与顺康时期一样，这一时期西洋传教士在中西双方相互认识上仍然充当了重要载体，对乾隆帝认识西方也有很大影响。再者，英国在这一时期已走在西洋国家前列，与中国的交往也最多，其中发生在乾隆二十四年洪任辉北上告状事件和乾隆五十七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再加上大臣们的奏章，更加强了乾隆帝对英国的关注，因此乾隆帝对英国的认识，也就较其它国家尤为突出。而乾隆时期官方文献《大清一统志》、《清朝通典》和《清朝文献通考》也较以往全面地记载了官方对欧洲和英国的认识，这些都使乾隆帝的西洋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西洋各国必需天朝之物产

1793年，乾隆帝在给马戛尔尼使团回国敕谕中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sup>①</sup>这段话中反映的最核心思想就是“西洋诸国必需天朝之物产”。而这一思想的产生，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其原因已在乾隆帝的这道敕谕中表露无遗。

其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康熙统治时期，清朝在取代明王朝约半个世纪之后，即开始步入承平盛世。到了乾隆时代，中国封建经济在经过一千多年的社会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其繁荣程度大大超过了包括汉、唐在内的所有王朝。从人口数量来看，据专家分析：明朝末期中国人口实际为一亿以上，而到乾隆后期，达到了三亿以上，从侧面反映了粮食生产达到了以往历史的最高水平。在农业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手工业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如在丝织业、棉纺织业、制瓷、采铜、造纸、冶铁、井盐等行业中有了手工业场和包买商。此外，商业城镇的增加，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国家财政状况、国库储备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sup>②</sup>而且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表述的那样，清代中国与周边邻国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跨国的、自给自足的联合体，在这个体系内，它不但居于支配地位，同时与如朝鲜、日本、琉球群岛、菲律宾、爪哇、交趾、支那等各周边岛屿以及各内陆邻国保持频繁的贸易往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给封闭式的政治制度铸就了赖以依存的经济基础。

其二、“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这主要是由当时的中西贸易结构所决定的。虽然乾隆帝在1757年下令封闭了闽、浙、江三口通商口岸，只准广州一口通商，但中西贸易并未因此而受到削弱。以英国为例，18世纪的1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将其每年投入中国贸易的平均船运量作对

<sup>①</sup> 《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乙卯。

<sup>②</sup> 参考戴逸：《论乾隆》，《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比，英国对华贸易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增长速度，就会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这三个时间段，年平均船运量分别为：575吨、3440吨和8146吨。也就是说，50年代的年平均船运量相当于10年代的6倍，80年代的年平均船运量相当于10年代的14倍、相当于50年代的2.2倍。而且，80年代初期，英国对华贸易的船运量已经相当于它在50年代投入东方的全部船运量。

从瓷器出口来看，据材料统计，18世纪中西瓷器贸易发展到了最高峰。输入到欧洲的中国瓷器，无论数量还是种类，不但此前无法比拟，就是其后的时代，也难与其相提并论。17、18世纪之交以后，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瓷器不但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必需用品，而且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关联。瓷器从神秘走向普通，恰恰表明这种商品在市场上流通的扩大；而这一时期，欧洲的制瓷业尚处于实验和探索阶段，很难与中国相竞争，流通的扩大又恰恰反映了对中国瓷器进口量的扩大。

从丝绸出口来看，1760年以前出口英国的实际数量，除个别年份达到3万匹以上，其余大部分年份每年至少都在1~2万余匹间。其他东印度公司对丝绸的进口，也经历了与英国相似的过程。瑞典东印度公司，除首航中国的船，载回2.3万余匹丝绸，以后个别年份有达一二万匹以上者，其余也都为每年数千匹。荷兰、法国、丹麦等东印度公司每年进口的丝绸也在数千匹以上。<sup>①</sup>

从茶叶出口来看，18世纪以后，英国进口的中国茶叶，逐渐增多。1717年，“茶叶已开始代替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sup>②</sup>此后，英国进口茶叶量，迅猛增加。在40年内，从1717年进口的397532磅（约合2978担），增加到1757年的3735596磅（约合27982担）。<sup>③</sup>后者几乎是前者的10倍。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购置的返程货绝大部分也是茶叶。就一般情况而言，茶叶约占货价总值的80%，瓷器约占百分之十几，药材等杂货占百分之几。1764年至1784年，这20年中的前10年，中国每年出口到欧洲的茶叶，大

<sup>①</sup> 参考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sup>②</sup>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册，第156页。

<sup>③</sup>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p.538-539.

体维持在 13 万余担；后 10 年中，将近 16 万余担。现依据 1776 年—1784 年（中间缺少 1782 年）的统计数字，制表如下：<sup>①</sup>

单位：担

国家	8 年中进口茶叶总量	所占百分比	年均进口量
英国	480249	38%	60031
荷兰	218149	17%	27268
瑞典	180300	14%	22538
丹麦	170927	13%	21366
法国	154942	12%	19368
普鲁士	24974	2%	
总计	1267958		158495

从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 18 世纪中西贸易中，中国在西方国家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其中茶叶、丝绸、瓷器等更是西洋国家来华所需求的主要商品。这就为乾隆帝“西洋诸国必需天朝之物产”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前面两点原因的表述中即可看到，乾隆帝个人拘泥于传统的贸易观，昧于世界贸易大势。乾隆时期，西洋国家早已打破地域局限，来往于世界各地，进行频繁的殖民掠夺和贸易扩张，积累国内财富，纵横世界各地。而乾隆帝由于受华夷理念支配下的传统贸易观念及自身知识的局限，以及清王朝了解外部信息渠道的闭塞，对此不甚知之，只看到即使实行一口通商，严格限制西洋人来华，西洋商人来华贸易仍有增无减。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等不断运往西洋国家，而这些国家虽然不远万里来中国贸易，却不能提供适合中国的商品，反而每年要用大量的金银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中国货物。对此最可能、也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西洋诸国必需天朝之物产”。而且从 18 世纪中叶起，“英国饮茶的习俗已上下蔚然成风”<sup>②</sup>，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数量急剧增加，使中国人普遍产生了这样一种

<sup>①</sup>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1 册，第 406 页。

<sup>②</sup> 黄时鉴：《茶传入欧洲及其欧文称谓》，《学术集林》卷 5。

错觉，认为“番人性嗜乳酪，胶结肠腹，唯大黄茶叶荡涤称神，一不的食，立致困病。”<sup>①</sup>这种看法在中国非常盛行，当时处于与外界交往最前沿地区的香山县竟将此载入县志，“英吉利……地无田，人不耕，惟贸易及劫掠。贸易以粤东为大，尤重中国茶，数日无茶即。”<sup>②</sup>这也说明乾隆帝“西洋各国必需天朝之物产”观点的产生，不乏其社会根源。而顺康雍三帝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对乾隆帝也影响很大。如前所述，康熙时，康熙帝也不重视西洋贸易，不许国人去西洋国家贸易，将与西洋贸易放在可有可无的行列，这种政策的背后思想就是认为大清帝国无需西洋国家物产。而这一思想认识完全为乾隆帝所继承，从而明确提出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而认为“西洋诸国必需天朝之物产”，无非是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当时清朝自身经济的发展、中西贸易结构的变化所做的进一步延伸罢了。

应该说，乾隆帝“西洋诸国必需天朝之物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中国是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最大的贸易对象，与中国的贸易对这些国家的国计民生有重大的意义，这一点从上面所列举的中英贸易数字就可以看出。不过，乾隆帝尽管认为“西洋各国必需天朝之物产”，但并不象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反对海外贸易。作为“天朝”“怀柔远人”的一种恩赐，他在即位之初，对西洋贸易政策也比较宽松，为外商来华提供了便利。乾隆元年十月初六日（1736年11月8日），他下圣旨说：“朕闻外洋红毛夹板船到广时泊于黄埔地方，起其所带炮位，然后交易，俟交易事竣，再行交还。至输税之法，每船按梁头征银2千两左右，再照则抽其货物之税，此向来之例也。乃近来彝人所带炮位，听其安放船中，而于额税之外，将伊所携卖货现银，另抽加一之税，名曰交送，亦与旧例不符。朕思从前洋船到广，既有起炮之例，此时仍当遵行，何得改易。至于加添交送银两，尤非朕加惠远人之意，着该督查照旧例按数裁减，并将朕旨宣谕各彝人知之。”<sup>③</sup>这道谕旨的精神表面上是按照旧例行事，实质上却是安抚英商。因为这里提

<sup>①</sup> 萧令裕：《粤东市舶论》。

<sup>②</sup> 《香山县志》卷四“海防”，道光十年刻本。

<sup>③</sup>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外交类，第44号。

到的第一项命令，后来经地方官员奏报实情取消了，而第二相命令则完全执行了，这就满足了英商提出已久的要求。乾隆八年（1743年），他又规定：外洋船来“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银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十分之三”<sup>①</sup>。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又准免珍珠、宝石之税”<sup>②</sup>。乾隆十二年（174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俟夷船回棹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乾隆帝却比较宽容，不同意地方官吏的意见，复示“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sup>③</sup>正如两广总督庆复所说的那样，“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洋贸易，国课民生均有裨益”；“就粤而论，藉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约计数十万人。”乾隆帝当然也看到了贸易给国家财政收入带来的益处，所以在丝斤出口问题上，也能灵活处置。总督苏昌曾以英商呈请弛丝斤之禁，奏请照东洋办铜商船搭配绸缎之例，每船准带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万。乾隆帝准其请，并谕：“前因出洋丝斤过多，内地市值翔踊，是以申明限制”，“然自禁止出洋以来，并未见丝斤价平”，“此盖由于生齿日繁，物件不得不贵”<sup>④</sup>，从而照样准许丝斤出口。那么乾隆帝又为什么在乾隆二十二年，下令只准西洋人在广州一口贸易，实行严厉的一口通商政策呢？这就涉及到政治与经济孰轻孰重和对清朝本身的认识问题。

由于缺乏对西洋国家本质上的认识和其发展概况的了解，乾隆帝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总是以朝贡、通商的眼光来看待西洋人。而乾隆帝“西洋诸国必需天朝之物产”的观点，更坚定了他将阻断与西方的贸易作为惩戒他们最有效的方法的认识。西人若有不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封舱”（即停止对外贸易），而无须通过军事、外交等途径。在他看来，中国海外贸易仅仅是“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用以怀柔“远人”的手

<sup>①</sup> 《清朝文献通考》卷33。

<sup>②</sup> 《清高宗实录》卷1201，乾隆四十九年三月。

<sup>③</sup> 《清高宗实录》卷305，乾隆十二年十二月。

<sup>④</sup> 郭成康：《清史编年》（乾隆朝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00页。

段，赐予“外夷”的恩惠而已。这种观念，来华的英国使臣看得也非常清楚，“中国一向自认为是天府之国，可以不需要对外贸易而自足自给；中国同任何外国的贸易，绝不承认是互利，而只认为是对外国的特别恩赐。”<sup>①</sup>既然是恩赐，那么就是可有可无的，就是可以收回的，进行恩赐的目的也就不是恩赐本身，而是借恩赐维护自己政治上的统治。乾隆帝就曾因此三次停止恰克图贸易，将对外贸易当成是“羁縻”西人极为重要的手段。他特别强调“怀柔之中，仍应隐寓防闲之意”，旨在“总于抚驭绥来之中，不失天朝体制”。因而，他对外贸易政策的另一主要内容，就是如何“防范外夷”，如何监督中国商人。乾隆十年（1745年），清政府将中国传统的保甲制度正式引入行商制度，即所谓的“保商制度”。而《防范外夷规条》的颁布，作为清政府第一个全面管理外商的正式章程，它以一口通商制度为基础，对保商制度进一步发展，使之成为一套日臻完密的外贸管理制度。乾隆帝建立这套制度的用心是相当深远的，他要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确保税收，防“夷”防民，将对外贸易的格局纳入封建经济的轨道。洪任辉事件之后，乾隆帝就总结认为：“内地何所不有，与其多购之洋船而番船乘机挟制其下，又因缘为奸，不如嗣后量从减办，尤为正本清源之计。”<sup>②</sup>于是进一步限制出口和进口，维护统治。后来清政府又颁布了一些条令，弥补防范条规的不足，这些规定总的指导原则就是加强管理和限制。

十八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商船的活动重心逐渐向闽、浙沿海移动，乾隆帝担心澳门历史重演，“宁波又成一澳门”，出于肃清海疆、防范侵略的考虑，逐开始紧缩沿海多口自由通商的政策。西洋商人一开始改变贸易路线，乾隆帝就认为外国商人在浙江活动，“浙民习俗易器、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不久在沿海官吏的不断奏请下，进而认为“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近年乃多由专为贸易而至者（指宁波）。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觉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设一市，恐积久居留内地者益众，滨海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

<sup>①</sup> [英]斯当东著 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皇帝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82页。

<sup>②</sup> 《清高宗实录》卷592，乾隆二十四年七月。

道。”<sup>①</sup>遂决心限制宁波贸易，并指出：“近年歼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不爱，以示限制，意并不在增税也。”<sup>②</sup>乾隆帝试图以这种“不禁之禁”的措施来迫使西方商船转向广东沿海，然而，由于浙江货价比广东低廉，中间又省去了内陆的户关税，即使增加关税，仍然有利可图，西方商船仍不断前来。于是，当年十一月，乾隆帝断然下令：“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为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掉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sup>③</sup>最终关闭了闽、浙、江三口岸，实行一口通商。

乾隆帝对外政策的转变，表面上是由英商频往宁波通商和洪任辉事件引起的对外来贸易的警觉，而实际的原因却如他在上谕所说：“此等贸易细故，无烦重以纶音。”<sup>④</sup>大清帝国并不需要西洋人的贸易，反而“西洋各国必需天朝之物产”。换言之，清王朝并没有与西方开展贸易的需求，而只是西方各国对同中国贸易有所依赖，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乾隆帝在同西方贸易中所采取的对策。

## 2、英吉利于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

虽然十八世纪的中国海疆比烽火连天的十九世纪要平静的多，但乾隆帝已经察觉到，如果不遏制咄咄逼人的西方势力，不保持和强化传统的治国安邦政策，就不能维护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尽管其或多或少存有“天朝上国”、虚骄自大的心态，但对日益猖獗的外来势力，怀疑与防范的心理依然贯穿其统治之始终，尤其对这一时期英国的认识与防范。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结束后，他就明确指出：

<sup>①</sup> 《清高宗实录》卷 516，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乙亥。

<sup>②</sup> 《粤海关志》卷 8，“税则”。

<sup>③</sup> [清]王之春撰 赵春晨点校：《国朝柔远记》，中华书局，卷 5，第 103 页。

<sup>④</sup> [清]王之春撰 赵春晨点校：《国朝柔远记》，中华书局，卷 5，第 103 页。



“夷人(指英吉利)在西洋最横行霸道,他们船只如梭,士兵成群。”<sup>①</sup>“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sup>②</sup>确切认识到英国国力在西洋国家当中的强悍地位。

对西洋外来势力的威胁,早在1716年,康熙帝就已经有所预见,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雍正帝也曾认识到:“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西有回人,朕欲阻其内入,毋使捣乱我中国。”<sup>③</sup>虽然此时他们的认识还很模糊、不确切,对西洋人的入侵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尚处于一种“天朝上国”的虚幻里,但仍为乾隆帝加强对西洋认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乾隆即位后,广东提督张溥即于元年八月向其奏请说:“洋船抵粤,每年或捌玖只、拾余只不等,每船装载肆伍百人,人各有鸟枪壹杆,其火炮多至参拾余位。兼之赋性强悍,蛮野无知,实非善类。向来鬼子洋船停泊黄浦,每夜施放枪炮,声震数里,附近居民,已属不安,今又持枪伤死乡民,强悍已极,民人甚为畏怯。黄浦离省仅贰拾里,乃腹里内地,外夷聚集多人,往来省城,伍陆成群,身带器械,登岸伤人,甚非所以绥靖地方也。又查,虎门之外澳门地方,原为夷商洋船码头,商货出入要道,外来洋船俱就澳门内拉青角湾泊。嗣于康熙贰拾伍年户部议覆海税监督宜尔格图疏称,洋船湾泊黄浦,以便交易,奉准遵行。但相沿日久,化外夷人往往顽梗滋事,似宜因时变能。仰恳天恩,仍令外来洋船照旧于澳门内拉青角湾泊,则内地民安,外夷无生事之端矣。”<sup>④</sup>阅此奏章,乾隆帝切实感受到西洋国家对清帝国可能存在的威胁,但这时他还没有认识到英国在西洋国家中的地位。这一点,从当时官修文献关于西洋国家的记载即可看出。1784年乾隆帝下令撰修的清朝第二部《大清一统志》里,关于西洋国家的记述基本上保持着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的说法,认为西洋大国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根本没

<sup>①</sup> 1793年10月2日给长麟和其他人的廷寄,转引自张芝联 成崇德编撰:《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论文集》,1965年。

<sup>②</sup> 《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乙卯。

<sup>③</sup> 《坊表信札》,载《耶稣会士通信集》第三卷,第363页。

<sup>④</sup> 《广东提督张溥奏请仍令外来洋船照旧于澳门内拉青角湾泊折》,载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有提到英国的名字。只是到了后来的《皇清四裔考》，才有了关于英国的描述，书中记载：“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国居西北方海中，南近荷兰，红毛番种也，距广东界计程五万余里。国中有一山，名间允，产黑铅，输税入官。国左有那村，右有加厘皮申村，皆设立炮台；二村中皆有海港，通大船，海边多产火石。王所居名兰仑，有城，距村各百余里。王世系近者为弗氏京亚治，传子昔斤京亚治，传孙非立京亚治，即今王也。”第一次在官方书籍中有了关于英国较为详细的介绍。

随着中西贸易的逐渐频繁，而其中与英国的贸易又占了绝大部分，清朝方面对英国的了解遂日渐深入起来，较其它国家尤为突出。在当时与英国贸易往来当中，常常伴随着武装冲突的发生。最早的一次中英冲突是1637年威代尔船长（John Weddell）率舰队来华，希望能在葡萄牙人的帮助下开始与中国贸易往来，在葡人委婉拒绝之后贸然直闯广州，与中国方面发生冲突。此后英商虽然逐渐加入了在广州的洋商行列，但中英之间还是屡有冲突发生。比如：1744年，有五艘英国军舰闯入中国南海。1745年，英人俘虏了两支从马尼拉开出的法船，还想在广东洋面捕撈正要进口的三支法国商船，当时已任澳门海防同知的印光任在侦察到这些情况后，即禀报广东当局，调集水师，分布附近防范，迫使英国军舰无计可施，才将船开走。葡萄牙窃据澳门以后，中外民人互相斗殴杀伤的事件时有发生。1743年，澳门发生葡萄牙晏些卢殴毙华人陈辉千案。1759年，英国殖民者不甘心乾隆帝“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的谕令，经过精心策划之后，决定继续派船北上，并任命洪任辉充当先行官直奔天津，扬言要上京告状伸冤。另外，英国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非常眼红，“屡至澳门呈递夷禀……希冀效尤”<sup>①</sup>。在征服廓尔喀的战斗中，英国人甚至出兵支持廓尔喀，企图阻挠清朝的军队。上述一系列事件使乾隆帝更加注意对英国的了解，最终确切地认识到英国人在当时西洋国家中较为强悍的地位。而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期间，双方在礼仪上的争执，以及马戛尔尼提出的六点“非分干求”，使乾隆帝更加确定了这一认识。

<sup>①</sup> 《粤海关志》卷26，《夷商一》第2页。

因此在政策上，他对西洋国家，尤其英国，更加注意和防范。1793年，在拒绝马戛尔尼使团的全部要求之后，乾隆帝就怀疑英国政府可能因此生事捣乱。在热河时，他就告诫军机大臣：“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遂所欲，必怀决望，恃其远险，藉以生事，亦未可定。”当然，在那个时候他还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来认识中英关系问题，只是认为英国不敢有大的举动，“只可能于澳门小有滋扰”<sup>①</sup>。因此，他命令两广总督觉罗长麟“当存之于心”，“先事防范”<sup>②</sup>，特别要注意防止在澳门和广州的其他外商与英人勾结。从热河回到北京后，乾隆帝对英国的担心愈益加重，多次下令说：“各省海疆，最关紧要”，进一步命令沿海各省督抚，会同各省提督及沿海各镇守，“相度形势，先事图维，毋任英吉利夷人潜行占据”沿海岛屿，如遇英船以通商为名驶至广州以外各口岸，“即行驱逐出洋，倘竟抗违不遵，不妨偃以兵威，使知畏惧”，为此要加强海防，沿海口岸必须“防守严密”<sup>③</sup>。他认为：“外夷贪狡好利，心性无常……今既未遂所欲，或致稍滋事端。虽天朝法制森严，万方率服……但观该国如此非分干求，究恐其心怀叵测，不可不留心筹计，预为之防。”<sup>④</sup>从这些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帝对于“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的英国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不排除其给海疆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为防止英国人动武，他于九月初一日谕令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督抚及粤海关监督：1、加强海防。各省海疆要整肃营伍，英使团过境，“使之有所畏忌，弭患未萌”，珠山等海岛，严加防范，绝不能任英人潜行占据。2、防止沿海奸民与英人勾结，“毋任滨海奸民勾结外夷，此为最要”。3、不准英国商人至天津、宁波等处贸易。照例可在广东指定地方贸易，“粤海关抽收夷商税课原应按则征收，严禁吏胥需索”。对英国商船收税，“因不便遽减其税，亦不可丝毫浮收……公平收纳，务与西洋别国相同，

<sup>①</sup> 《清高宗实录》卷 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乙卯。

<sup>②</sup> 《清高宗实录》卷 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乙卯。

<sup>③</sup> 《清高宗实录》卷 1436，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sup>④</sup> 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8月第1版，第219页。

不可独露市惠红毛之意，转使骄矜长智也。”<sup>①</sup>此次该国“如此非分于求，究其心怀叵测，不可不留心筹计，……因思各省海疆，最关紧要。”<sup>②</sup>“思英吉利贡使……必以此次向天朝进贡，大皇帝十分优待，并妄称许令总理西洋各国贸易之事，向各夷商等夸大其词，欲思从中抽分税银，以为渔利之计，西洋各国夷商本素畏英吉利强横，而该国在澳门贸易较多，今又假天朝声势，捏造谕旨，诬诱夷商均未可定。”<sup>③</sup>“澳门向有西洋尼僧夷商，俱极信奉是否与英吉利一气，体察详确，分别相机办理。”<sup>④</sup>“英吉利于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或因不逐所欲，于澳门夷商内勾通煽惑且捏称受恩优渥，妄欲总理各国贸易，从中抽分。”

除了防止英人动武之外，乾隆帝还加强了对英吉利的布防政策。当他查到，“澳门居住夷商多系西洋别国之人，与英吉利本非一气，因伊等在该处住居日久，一切房舍食用俱属便宜，如有英吉利夷商到澳，须向西洋人赁屋居住，每岁不过数十人，住澳也不过数十日，彼此并无买卖交涉之事。”<sup>⑤</sup>“该处贸易之西洋人等多系西洋别国之人，并非该国所属”时，认为“临时当先安顿在彼贸易之西洋别国人等，使其各安生业，亦不致为所勾结，则英吉利即有诡谋，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但此不过为先事防范……此等外夷向化来廷，朕惟现其来意，伊若恭慎驯谨，则即量予加恩；伊若有不谙体制之处，亦即绳以礼法。”<sup>⑥</sup>他告诉长麟不必惊慌，“该处贸易之西洋人等，多系西洋别国之人，并非该国所属，想未必皆与彼一心”<sup>⑦</sup>，且“西洋各国夷商本素畏英吉利强横”<sup>⑧</sup>。甚至在他得知“该国（即英吉利）与西洋向不同教，亦无往来”<sup>⑨</sup>时，竟决定联合澳门的宗教势力，“抚夷制英”。谕令说：“问澳门有西洋妮僧，在彼焚修，各夷商俱极信奉，如此妮僧，向不与英吉利一气交结，可将以上晓谕夷商各情节，亦使之闻之，令其暗中作主，若此夷尼系与英吉利

<sup>①</sup> 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8月第1版，第333页。

<sup>②</sup> 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8月第1版，第325-326页。

<sup>③</sup> 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8月第1版，第560页。

<sup>④</sup> 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8月第1版，第578-579页。

<sup>⑤</sup> 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8月第1版，第693页。

<sup>⑥</sup>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廷寄。

<sup>⑦</sup>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廷寄。

<sup>⑧</sup>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1页。

通同一气者，即不必告知，恐转有泄漏。”<sup>①</sup>

虽然加强了对英国的防范，但受顺康雍三帝对西洋国家不重视的影响，及本身“天朝”观念的支配，乾隆帝对英国还是有点轻视，认为：“该国远隔重洋，该贡使目观天朝礼制森严，四夷畏服，断无意外之虞。”<sup>②</sup>考虑到英国人的装备，他更认为无需紧张，“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各口岸防守严审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sup>③</sup>对英国的态度依然是“怀远薄来而厚往”，很大程度上含有恩赐的意思。无疑，英国仍被乾隆帝摆在低一级的地位上，与周边国家的地位一样，都应匍匐在“天朝”脚下。而洪任辉事件的解决，更使乾隆帝坚信了这一点。洪任辉在澳门被圈禁三年后获释，船过炮台，洪任辉“尚知感畏，在船行礼叩谢，由虎门出口放洋而去。”<sup>④</sup>经过一番争执，乾隆帝满意地看到，他仍然能用几百年来的传统武器，把不想接触的一切拒之化外。谁违背了天朝的体制，他都可以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去惩罚，没有人可以干涉这一点。西洋人要想与中国交往，同样也要遵守天朝的体制和法律。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也毫不例外，“钦差”一律改为“贡使”；觐见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否则，取消一切活动安排，尽早驱逐回国。

### 3、天主教有害于中国之风俗人心

天主教自明末第三次传入中国，到乾隆时期已有二百年。顺康雍三帝都曾对此甚为关注。在对天主教认识上，乾隆帝认为“西洋人私至内地传教惑众，最为风俗人心之害。”<sup>⑤</sup>从根本上定性天主教为“风俗人心之害”。在这一点上，他受雍正帝影响很大，雍正帝就曾明确指出：“本地无赖之人相与往来，私从其教。恐久之湍染益深，甚有关于风俗。”但为什么认为天主教有害于风俗人心呢？这与乾隆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情况及乾隆帝个人因素有关，乾隆帝

<sup>①</sup> 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8月第1版，第752页。

<sup>②</sup>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掌故丛编》，《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第65页。

<sup>③</sup> 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8月第1版，第20页。

<sup>④</sup> 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外交类43号，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苏昌奏折。

<sup>⑤</sup> 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下），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31页。

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已经为其这一思想作出了部分解释。

第一、“私至内地传教”。本来，由于康熙末年“礼仪之争”发生，清朝已于1720年开始禁止天主教传播。<sup>①</sup>到了雍正时期，清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查禁天主教，并将西方传教士逐送澳门。<sup>②</sup>但西方传教士不甘被逐，不久他们又陆续潜入内地传教，非法入境。乾隆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报，在其管辖福安县境内抓住私至内地传教的西洋传教士费若用、德黄正国、施黄正国、白多禄、华敬等五人，其中白多禄供认说：“伊等或自康熙年间、或自雍正年间陆续从澳门来至福安，起初同来共有十人。后或回至澳门，或往漳州、龙溪、后坂地方，其在福安者，现止五人。”“行教夷人来至中国，彼国皆每岁解送钱粮至广东澳门，澳门夷人雇请本处土人，潜带银两密往四处散给。”<sup>③</sup>乾隆十一年十一月，江西省阳县查获西洋传教士李世辅。乾隆十二年，江苏巡抚安宁于昭文县又查获西洋传教士谈方济、黄安多等。前后三年陆续在其它各省，如广东、直隶、湖广、江浙十余省，抓获私至潜入内地传教的传教士十余名，捉拿中国教徒上千人，并搜缴到大量经书、图像等宗教用品。这在乾隆帝看来，在经过近三十年的禁教之后，“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sup>④</sup>，而私至内地传教的传教士仍散布全国。其传教之多，信徒之广，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觉。在没有任何监督和管辖下，这种中外民人之间的广泛接触，无论是从“立中外之大防”的角度，还是从世俗人心的角度，都是有害的。

第二、“惑众”。乾隆帝曾指出：“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sup>⑤</sup>认为天主教是异说，而中国本身的儒家思想才是维护圣贤道统的根本，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最根本的差异，在社会规范、价值观、信仰等方面有

<sup>①</sup> 参考顾卫明：《中国天主教史编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53页。

<sup>②</sup> 参见陈东林：《雍正驱逐传教士与清前期中西交往的中落》，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sup>③</sup> 《福建巡抚周学健奏陈洋教之害请将西洋传教士白多禄等按律治罪缘由折》（乾隆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212至216页。

<sup>④</sup> 萧致治 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6页。

<sup>⑤</sup> 萧致治 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6页。

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而且是在严厉禁教的情况下，中国仍有大量民众加入天主教，一些王公贵族也迷惑其中，“使入其教者不认祖宗，不信神明，以父母为借身，以西洋人为大父，且惑其邪说幼女守童贞不嫁，朝夕侍奉西洋人，男女混杂，败坏风俗。”<sup>①</sup>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畏杀头、满门抄斩，一心归顺天主教，达到痴迷化的境界；而且是享有高度文明的“天朝”子民归顺于“化外蛮夷之邦”的“异说”，这在乾隆帝看来，无疑都是天主教妖言惑众的结果。地方官员们也认为天主教具有对民众的迷惑性，上奏说：“历来白莲、弥勒等教聚众不法，皆无知奸民借此煽惑乌合之众，立即扑灭。天主教则不动声色，潜移夥诱，使人心自然乐趋，以至固结不解，其意之所图，不屑近利，不务速成，包藏祸心而秘密不露，令人坠其术中而不觉，较之奸民所造邪教为毒更深。即如福安一县，不过西洋五人潜匿其地，为时未几，遂能使大小男妇数千人坚意信从，矢死不回。纵加以垂楚，重以抚慰，终莫能转。假令准此以推，闽省六十余州县，不过二三百西洋人，即可使无不从其夷教矣。又况一入彼教，虽君父尊亲亦秘不知，性命死生亦所不顾，专一听信，甘蹈汤火，且衿士缙绅兵弁吏役，率往归附，官员耳目多所蔽塞，手足爪牙皆为外用，万一不加剪灭，致蔓延日久，党类日滋，其患实有不忍言者！”<sup>②</sup>这使乾隆帝更加确信了对天主教的既有认识，谕令张廷玉、傅恒通知各省督抚说：“现在福建福宁府属有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妇礼拜诵经。又以番银诱骗愚民，设立会长，创建教堂，种种不法，挟其左道，煽惑人心，甚为风俗之害。天主教久经严禁，福建如此，或有潜散各省，亦未可知。可传谕各省督抚等，密飭该地方官严加访缉。如有以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sup>③</sup>

第三、乾隆帝排斥天主教的第三个原因，主要是由于在他看来，天主教教义与中国封建伦理道德及等级制度存在着严重冲突及对

<sup>①</sup>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卷 294，第 2 号，乾隆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折。

<sup>②</sup> 《福建巡抚周学健奏陈洋教之害请将西洋传教士白多禄等按律治罪缘由折》（乾隆十一年九月十二日），《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 220 至 223 页。

<sup>③</sup> 引据自《甘肃巡抚黄廷柱奏覆遵旨访缉并无西洋传教士在境折》（乾隆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 224 页。并参据《两广总督策楞等奏明查封澳门进教寺不许内地民人入教折》、《署江苏巡抚安宁奏覆查无西洋人在境及办理宋从一等习教案折》、《两江总督尹继善奏覆遵旨查无西洋人在境传习天主教折》等，见《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 225 至 231 页。

立,而这种对立对其君主专制构成了极大的潜在威胁。天主教宣扬众生平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严格等级秩序的宗法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异化”。中国的“礼”,是儒家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来维系的。“礼”的另一个角度就是等级秩序,一方面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是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工具;另一方面是封建家族制度的需要,在广大民众中有深厚的基础,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天主教教义本身就与中国的礼教纲常水火不相容,允许它的存在,无疑是对中国风俗人心的一种破坏。将这种风俗人心之害上升到政治角度,势必也是对政治人心的危害。清朝在建立的一百多年中,满族统治者基本上接受了中原文化,在这种文化体制下,皇权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从来不受神权的束缚;相反,倒是神权从属于皇权,皇权本身就包含了神权,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sup>①</sup>而这一点,与西方的神权有着根本的对立,在中国封建社会,从来就不存在象西方那样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神权。雍正帝就曾认为:“教徒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唯尔等之命是从,现在虽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sup>②</sup>乾隆帝在继承了这一观点后,也明确指出:“至中国民人,一入其教,信奉终身不改,且有身为生监,而坚心背道者。”<sup>③</sup>在他看来,臣民改信天主教后,就会完全倾心于西洋人,而不会再甘心臣服于皇权的统治,这对大清帝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根本的人心之害。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乾隆帝得出了“天主教有害于中国之风俗人心”的结论,但在具体的政策上,乾隆帝吸取了前面三帝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宽严相济”的方针。康熙帝只许在中国的西洋人信教,不许中国人皈依,后来又规定中国人信教是有条件的,即传教

<sup>①</sup> 《左传》成公十三年。

<sup>②</sup> 萧致治 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4页。

<sup>③</sup> 《清高宗实录》卷275,乾隆十一年九月。



士不能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必须按“利玛窦的规矩”<sup>①</sup>。乾隆帝继承了康熙这一策略，同时也部分吸取了雍正帝的禁教措施，对西洋人在中国信教并不禁止，只是不准满族人信教、入教。他曾对郎世宁说：“朕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朕唯禁旗人信奉。”只是后来当他听说日本明正十四年（1637年），发生在日本九州岛原、天草地方，由益田时贞（即天草四郎）领导的天主教教徒暴动的事情，以及葡萄牙殖民势力利用天主教征服印度的事实后，对天主教的管制和防范才更加严厉，也更加敏感。乾隆十八年安徽发生了马朝柱聚众谋反案，马朝柱和外国人毫无关系，但由于其借用了“西洋寨”的名目，乾隆帝就认定与天主教有关，加强了对天主教的警戒。

乾隆五十七年，在给英王的第二道敕书中，乾隆帝明确指出：“尔国所奉之天主堂，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尤属不可。”<sup>②</sup>其实英国人所有的要求中，并没有提到传教之事，正如马戛尔尼在和松筠的谈话中所说，“此事虽本于华人对于欧人之经验，而吾英人对于宗教问题，意见与欧洲它国之人稍异，盖它国之宗教家主张一尊之说，以为世上既有天主教，余教悉无存立之余地。故必力布天主教，使余教一律消灭。吾英人之意则以为吾人既崇拜天主，而天主之意虽在化民为善，它种宗旨之宗教亦罔不与天主教相同。宗旨既同则无论何种宗教，凡天主之意许其存立者，吾人即不必强用人力以摧残之。故英人虽笃信宗教，而传教之热度则不敌葡萄牙诸国。试观澳门、广州二处，它国人民之至其地者恒有一、二宗教家参错其间。吾英吉利则但有商人，终始未派一以传教为业之教士来此，即此次敝使随从各员之中虽有一、二人系属教友，而其任职乃在管理各种礼物，并无传教之责，仍不能以完全之教士目之。当知吾英人与葡萄牙人虽同隶一教，而传教之热心各不相同。今敕书之中忽有尔英吉利人素喜传教，布为谬说等语，实与事实不合，想系葡萄牙教士欲令中英二国互想恶感，故以此种不经之说进

<sup>①</sup>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

<sup>②</sup> 萧致治 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6页。

于皇帝之前，皇帝从而引为敕书中之材料，否则华人素昧欧洲情形决不做此揣测之辞也。”由此反映出的问题，一是乾隆帝不了解英国宗教，认为天主教是西洋国家都有的，西洋人到中国来，除了贸易，剩下的就是为了传播福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担心天主教影响国家安全的敏感。他的大臣松筠透漏了乾隆帝的此谕的原因：“这是因为向来到中国的西洋人大多很喜欢传教，皇上恐怕你们英国人也有请求传教之意，故此声明在前。”<sup>①</sup>

乾隆帝虽然与雍正帝一样认为天主教是邪教，但表面上对传教士的态度比雍正帝热情，如出资重修天主教“南堂”，大赦苏努家族等，使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较雍正期间有所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乾隆帝对天主教的宽容。其内心对天主教的顾忌与排斥却与雍正帝无异，他限制传教士的活动，清除潜伏在地方的传教士，不许他们随便回国，如钱德明所说：“从来没有一个皇帝象这个皇帝这样虐待他们，并对他们所传播的天主教颁布过最可怖的禁令。”<sup>②</sup>而且对西洋人来华之后的通信、服饰、回国之事，乾隆帝也有明确规定，要求“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sup>③</sup>但之所以还要留下天主教传教士，只是为了利用其科学技术知识和各种技艺，为其生活享乐服务。按他的愿望，传教士留下来只是为了发挥他们的科技专长，而不是传教。正如他自己所说：“嗣后西洋人来广，遇有愿进土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省则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随时详报，请旨护送来京。”<sup>④</sup>

对于来华后遵守天朝体制的传教士，只要不“私至内地传教惑众”，具有科学技术才能，乾隆帝与康熙帝一样给予优待，赋予官职，充当翻译，参加接待外国使节等。但对于不遵守体制，违背传教政策的传教士，乾隆帝与雍正帝一样，严加惩处。惩治大致可分为：一是押送澳门、广东令其回国，如乾隆十一年在福建安县查拿的费若用；二是就地拘押候旨，如乾隆五年潜入山、陕传教的李世

<sup>①</sup> [英]濮兰德 白克好司著：《乾隆英使觐见记》，珠海出版社，1995年，第116页。

<sup>②</sup> 转引自后滕末雄著《乾隆帝传》，载《清史译文》第10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资料室1979年油印版。

<sup>③</sup> 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8月第1版，第239页。

<sup>④</sup> 《清高宗实录》卷768，乾隆三十一年九月甲戌。

辅；三是解京收审，如乾隆四十九年，降旨各省“按名查拿”、“解京收审”<sup>①</sup>；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丙寅）四是直接处以重刑，如白多禄即以“谋为不法，在国宪所不容”之罪名被诛杀。不过，有时视情节之轻重也网开一面，如乾隆五十年，在处理潜伏四川、福建、江西三省的传教士时，他下旨将西洋人全部释放，并说：“此等人犯不过意在传教，尚无别相不法情事，念该犯究系外夷，未谙国法，若令永禁囹圄，情殊可悯，所有巴地里央等十二犯俱加恩释放，如有意留京城者，即准其赴堂安分居住，如情愿回洋者，该部派司员押送回粤。”<sup>②</sup>但有时也随情况的不同，进行秘密处决，如曾谕江苏巡抚安宁，西洋传教士潜入内地传教，可不露风声，“令其殒毙”<sup>③</sup>。密谕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将监禁候决的华若亚敬等四名西洋传教士在狱中秘密处决。

有一点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乾隆帝对传教士的态度，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于西学的态度。乾隆帝虽然在各方面向来以其祖父康熙帝为表率，但在对待西学这一点上，却远不象他的祖父那样热衷。乾隆帝禁止天主教，虽然留下了懂科技的传教士，但也不是出于对西学的重视，这一点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四库全书》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其中所录的西学书目是按照乾隆帝所定的择书标准收录的。从明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传教到乾隆朝为止，西方传教士所著述的西学书籍及他们从欧洲带来的书籍当不下千余种，而《四库全书》中仅录入西学书籍二十二种，存目十六种，共计三十八种，不及当时中国西学书籍的十分之一，与《四库全书》收入的三千四百六十一一种，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七种书籍的庞大数目比更是沧海一粟。这就十分明显的反映出了乾隆帝对于西学的不重视。这固然与乾隆的个人因素有关，但肯定也与清初知识界盛行的那种“华夷之辨”、“西学中源”的观点不无关系。“西学中源”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保守士大夫对西学的排斥情绪，满足了他们不甘心居于西人之下的自大心理，但同时也使中国的知识界不能清楚的认识到了西学的价值及中国与西

<sup>①</sup> 《清高宗实录》卷 1218，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

<sup>②</sup> 《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二册，第 868 页。

<sup>③</sup> 郭成康：《清史编年》（乾隆朝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03 页。

方在科技上的差距。乾隆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即使只是在某些方面，也不可能承认西学优于中学，何况他对西学连基本的兴趣都没有，所以传教士所怀有的科技知识在他看来是不足挂齿的，在不危及封建统治及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大清帝国可以留下几个传教士在宫中作作画，造造房子，但一旦感到传教士的活动会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传教士们被驱逐的命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不过，对于俄国的东正教，乾隆帝亦继同康、雍两帝一样，始终未予查禁。这种禁与不禁之间，正反映出了乾隆帝禁止天主教的原因。就这两种宗教自身而言，东正教比天主教有更强的政治性，也往往为沙俄的扩张服务。只是这时俄国还未将其作为向中国渗透的工具，东正教在中国也很少传播，乾隆帝自然不会认为它对自己的统治会构成什么威胁。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帝对两种宗教的认识，并不在于它们的教义本身，而是着眼于两种不同宗教对中国社会可能造成影响的问题。查禁天主教的原因，正如乾隆帝自己所说，“天主教有害于中国之风俗人心”。

#### 四、结 语

乾隆帝的西洋观，涵概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本文所考察的乾隆皇帝的西洋观，主要是他在对中西经济关系、西方政治实力和宗教看法方面，这三个方面虽然不足以代表乾隆帝西洋观的全部，但却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角度比较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乾隆帝对西方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间交往的增多，乾隆帝的西洋观比顺治、康熙、雍正三帝的西洋观更加深入和明晰，但这种深入和明晰又是在继承顺康雍三帝西洋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同西方的经济关系上，认为天朝无所不有，西洋诸国必需天朝之物产。在如何看待海外贸易及西洋物产上，顺康雍三帝与乾隆帝是相类似的，他们对与西洋国家的海外贸易也并不重视，认为同西方进行贸易对中国方面来讲是可有可无的，言下之意，也就是认为天朝不需要西洋物产。虽然没有明确表述为“天朝无所不

有”，但基本的思想认识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受本身的经济条件、传统地域概念的影响，还没有认为西洋国家必需天朝之物产，没有象乾隆帝那样认为这种贸易对西方国家的意义，从而将贸易作为“羁縻”西洋国家的手段，明确将对外贸易表述为对西洋国家的一种“恩赐”，用经济的手段为政治服务，将西洋人的来华贸易上升到“西洋诸国必需天朝之物产”的理论高度。而乾隆帝形成这一思想与当时时代背景又是分不开的，除了这一时期知识界“西学中源”说进一步系统化、固定化对乾隆帝造成的影响外，乾隆时代本身的经济水平也为乾隆帝这一思想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对西方国家政治实力的认识上，认识到“英吉利于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的国际地位。前面三帝中，只有康熙帝认识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而且这一认识还很模糊，从其对外政策上对西方国家的重视即可看出。其他两帝对西洋国家军事上存在的可能性隐患都没有明确的认识，更谈不上对英国个别国家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西洋大国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而不是英国。而这与其时代局限性有很大关系，顺康雍三帝时期，无论从贸易规模，还是从中西、中英交往的频率都无法与乾隆帝时期相比，在这样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自然产生了对西洋国家不同的认识。而随着中英间贸易的扩大及双方在外交上的一系列对立碰撞，乾隆帝对英国在西洋较为强悍的国际地位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而顺康雍三帝在这一点上的西洋认识对其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康熙帝认为西洋国家对存在威胁的明确表述，对乾隆帝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句话本身的模糊性，康熙帝对西洋国家威胁性的不重视，在乾隆帝处理中英关系上也可得到反映。乾隆帝虽然认识到“英吉利于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在对西洋国家的策略上也有所调整，尤其在措施上，对英国尤为防范；但仍然与其先辈们一样，在思想上仍有轻视的一面，顺康雍三帝的影子仍时常浮现。

第三、在文化方面，集中表现在他对于天主教的进一步认识，认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有害于中国之风俗人心。顺康雍三帝虽然在看待天主教时都保持着“非我族类，其心比异”的传统观念，但并

不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本身的风俗文化有直接冲突。顺治帝不仅允许天主教在中国存在、发展下去，而且对传教士还积极加以重用和保护。到了康熙时期，康熙帝继承了顺治帝的策略，采取了优容礼遇政策，他曾说：“西洋人到中国将三百年，未见不好处，若事无大关，从宽亦可。”<sup>①</sup>而晚年其之所以禁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礼仪之争”的发生。雍正帝虽然改变了顺、康两帝对天主教优容礼遇的政策，采取了禁教政策，但这与个别传教士的涉世性格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同他们对雍正帝政敌允禩的支持有关。雍正二年十月，他在给孔毓珣奏折上曾批道：“朕于西洋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念于我国圣人之道无甚裨益，不过聊从众议耳。尔其祥加酌量，若果无害，则异域远人自应一切从宽。尔或不达朕意，强之过严，则又不是矣。”<sup>②</sup>表现出对天主教本身的宽容性，但雍正帝较顺康两帝已经认识到天主教在华传播对风俗的影响，他说：“本地无赖之人相与往来，私从其教。恐久之湮染益深，甚有关于风俗。”不过，他并没有认为天主教的传播有害风俗。这与乾隆帝认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有害于中国之风俗人心有很大不同，而乾隆帝这一思想的产生除了在继承前面三帝对天主教的看法外，其本身所处时代的影响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乾隆时期，在严厉禁教近三十年之后，传教士“私至内地传教”等不法情事仍时有发生，中国入教人数还是很多，信徒遍及多省，这使乾隆帝深感天主教的惑世性，从而更加肯定地认为“天主教有害于中国之风俗人心”。

从上述与顺康雍三帝的纵向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帝西洋观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深入、明晰的一面，但如果将这种西洋观放到18世纪的世界横向坐标体系下，又暴露出其西洋观局限性的一面。首先在经济上，乾隆帝无视中西贸易对清朝自身的意义。一旦在贸易中产生摩擦，就下旨“封仓”，如多次停止恰克图贸易，而不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甚至主观性地认为，广开贸易，必然增加中外接触，不能有效“杜绝民夷之大防”，从而威胁到自己政权统治。在世界贸易日益发展的大格局下，乾隆却于1757年，断然关闭

<sup>①</sup>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1754条。

<sup>②</sup> 王之春著 赵春晨校：《清朝柔远记》第18页。

了闽、江、浙三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确定了一个多世纪的一口通商体制；而不是扩大贸易领域，广泛地与西洋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其次，乾隆帝虽然看到英吉利实力强悍，但由于受传统地理观念和华夷观念局限，始终认为“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sup>①</sup>英国只“可能于澳门小有滋扰”，“断无意外之虞”。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结束后，也只是在朝贡国中加上了“英吉利”名字，对其危害认识不足。再次，乾隆帝只看到天主教有害中国风俗人心不利的一面，没有认识到传教士东来，除了带来天主福音，也还带来有利于补充中国文化的西方文化，将两者一并排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化。

当然，乾隆帝这一局限性的西洋观，并非仅仅是个人原因，中国封建统治者几千年来传统的思维模式，特殊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西洋观的形成和发展，而这种西洋观对其以后清朝统治者西洋观念的形成及政策走向又产生了重大影响。

<sup>①</sup> 《清朝文献通考》卷 294，《四裔考一》。

## 参考书目

### 一、参考书籍

- 1、《清高宗实录》 中华书局影印 1985年版
- 2、《清圣祖实录》 中华书局影印 1985年版
- 3、《钦定圣祖仁皇帝圣训》 雍正九年
- 4、《香山县志》 道光十年刻本
- 5、《左传》 江南书局 2002年版
- 6、《清朝文献通考》 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 7、《乾隆朝上谕档》
- 8、梁廷枬：《粤海关志》（台湾）成文出版社 1968年版
- 9、单士元主编：《史料旬刊》 京华印书局 1930-1931年版
- 10、清仁宗敕撰：《高宗圣训》 嘉庆四年
- 11、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 12、萧令裕：《粤东市舶论》
- 13、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 1985年
- 14、印光任、张汝霖撰 赵春晨点校：《澳门记略》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 15、[清]王之春撰 赵春晨校：《国朝柔远记》 中华书局 1989年版
- 16、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 17、张芝联、成崇德编撰：《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论文集》  
1996年5月版
- 18、萧致治、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 19、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  
1996年8月 第1版
- 20、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掌故丛编》 中华书局 1990年版
- 21、《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故宫博物院 1932年版
- 22、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 中华书局影印本



- 23、[英]濮兰德、白克好司著：《乾隆英使觐见记》 珠海出版社
- 24、[英]安德逊：《英使访华录》 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
- 25、[英]斯当东著 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年 第1版
-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 27、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中华书局 1977年版
- 28、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
- 29、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年
- 3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
- 31、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辽海出版社 1999年
- 32、周 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 学苑出版社 2000年
- 33、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 34、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三联书店 1993年
- 35、[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三联书店 1957年中译本
- 36、郭成康：《清史编年》（乾隆朝）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 37、[清]陈伦炯撰 李长傅校注 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
- 38、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 39、[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年
- 40、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
- 41、戴 逸：《乾隆帝及其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
- 42、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
- 43、严中平：《科学方法十讲》 人民出版社 1986年
- 44、万 明：《中葡早期关系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
- 45、阮 元：《畴人传》 商务印书馆 1955年
- 46、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 东方出版社 2000年

## 二、参考文献

- 1、张 箭：《明末清初俄使出访中国初探》，载于《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
- 2、谢景芳：《清初抑制西学探论》，载于《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
- 3、黄庆华：《早期中葡关系与澳门开埠》，载于《史学集刊》1997年第4期
- 4、蒋祖缘：《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载于《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
- 5、庄国土：《鸦片战争前福建外销茶叶生产和营销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载于《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 6、张顺洪：《1790-1820年英国人对中国的评价》，载于《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3期
- 7、杨建华：《明清之际浙江地区中西文化的冲撞》，载于《明清史》1991年第7期
- 8、陈希育：《鸦片战争前西方对中国的贸易》，载于《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4期
- 9、杜石然：《明清时期的科学：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接触》，载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1年第4期
- 10、戴 逸：《论乾隆》，载于《明清史》1992年第6期
- 11、王先明：《论清代的“禁教”与“防夷”：“闭关主义”政策再认识》，载于《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 12、秦国经：《18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地图中的活动与贡献》，载于《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 13、韦庆远：《论康熙时期从海禁到开海的政策演变》，载于《明清史》1989年第6期
- 14、朱 雍：《洪仁辉事件与乾隆的限关政策》，载于《明清史》1989年第2期
- 15、王 超：《清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载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 16、鲁 方：《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载于《课外学习》  
1988年第2期
- 17、朱 雍：《论乾隆初政时期的对英温和政策》，载于《明清史》  
1988年第5期
- 18、廖仲安：《鸦片战争以前的“西学”偶谈》，载于《光明日报》  
1987年8月30日
- 19、邱 克：《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载于《明清史》  
1988年第7期
- 20、陈东林、李丹慧：《乾隆限令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及英商洪任辉  
事件》，载于《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 21、黎难秋：《爱新觉罗·玄烨与西学》，载于《安徽史学》  
1985年第1期
- 22、林铁钧：《汤若望与顺治帝》，载于《清史研究通讯》  
1985年第1期
- 23、[美]小约翰·威尔斯：《1662-1690年期间清朝与荷兰关系》，  
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9期
- 24、陈东林：《雍正驱逐传教士与清前期中西交往的中落》，载于《明  
清史》1985年第11期
- 25、陈尚胜：《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载于《中国史  
研究》1998年第1期
- 26、陈申如、朱正谊：《试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载于  
《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 27、张应龙：《鸦片战争前中荷茶叶贸易初探》，载于《明清史》  
1999年第1期
- 28、陈双燕：《从鸦片战争前对英使的接待看晚清的外交原则》，  
载于《明清史》1998年第1期
- 29、韩 琦：《康熙朝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活动》，载于《故宫  
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
- 30、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载于《中国  
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 31、章文钦：《明清时代荷兰与广州口岸的贸易和交往》，载于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32、吴建雍：《18 世纪的中西贸易》，载于《清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 33、陈尚胜：《清朝体制与对西方的被动应战》，载于《山东社会科学》1990 年第 5 期
- 34、李 刚：《论鸦片战争前中西贸易的发展阶段》，载于《西北大学学报》1994 年第 2 期
- 35、李金明：《清康熙时期开海与禁海的目的初探》，载于《南洋问题研究》1992 年第 2 期
- 36、王宏钧：《16 至 18 世纪：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载于《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
- 37、向玉成：《清代华夷观念的变化与闭关政策的形成》，载于《四川师大学报》1996 年第 1 期
- 38、麦劲生：《中英贸易与 18 世纪政治经济学者的自由贸易论争》，载于《清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 致 谢

这篇硕士学位论文从最初的选题、资料的搜集到具体的写作、修改，再到最后的定稿，都凝聚着我的导师陈尚胜教授的心血和关怀。在此，谨向我的老师致以深深的谢意，并对老师一直以来给我的学习和生活诸方面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表示感激，始终铭记于心。从师三年，老师的人格力量和学术魅力对我影响至深，使我终生受益。

晁中辰老师、张熙惟老师在论文开题报告时都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写作建议，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另感谢我的挚友董明、各位同门、同学等在论文写作、校订、打印过程中给予的建议、帮助和支持。

我的家人在我读书期间都给了我很多的关心和鼓励，使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一并表示感谢。

章庆生

2004年4月28日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1、作为正式代表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和台湾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纪念法显赴印取经由崂山登陆1590周年——法显与中国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浅谈法显西行及其意义》，并被收录于论文集。